

超越教师伦理困境*

——兼论教师教育信念培育

董辉 高文心

[摘要] 教育本质上的道德属性让教师工作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育人实践中,伦理挑战和行为困境不可避免。教师伦理困境源于现代学校的制度构建与持续变革,并随着当代教育系统的演化而趋于复杂。在学校、学生(家长)和同侪互动的实践场景,公私权衡、义利纠葛、轻重决断困扰着教师的伦理决策。工作场域,教师须用制度化的公开策略应对困境;生活场域,教师又以相应的潜隐策略调适自我。频发的决策困境和异化的伦理实践,消解着学校的办学活力,挫伤了教师的成长内力。超越教师伦理困境,应夯实培植教育信念的智识基础,补齐教师应对伦理困境的素养短板,创设为教师心灵赋能的社群空间,营造让教师安心从教的良序生态,助力教师在弘扬教育家精神的伦理实践中行稳致远。

[关键词] 教育家精神;教师伦理;教育信念;伦理困境

[作者简介] 董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高文心,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上海 200062)

教育在本质上是一项道德事业。^[1]教师作为传道授业的专职人员,矢志于让受教育者及整个社会朝持续向善的方向发展。教育的道德属性为教师职业涂上浓厚的伦理底色。现实中,教育又彰显鲜明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向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的过程,迫切需要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文化驱策和时代召唤下,教师不仅要提升自身的道德与伦理站位,还要在专业能力与素养上持续精进。其肩负多重职责,难免遭遇伦理挑战与行为困扰。为有效带动教师立德

修身、敬业立学、教书育人呈现新风貌,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除了要积极落实国家有关教师队伍建设的举措,还应正视教师日常实践中的伦理困境,透视困境的缘起、表征、相应的行动及伦理后果。唯此,才能有的放矢地营造适宜教育家精神落地生根的伦理土壤,提升教师从困境中突围的教育信念内力,助推其在弘扬教育家精神的伦理实践中行稳致远。

一、困境溯源:嵌入教育制度的伦理悖论

专业伦理守则是彰显教师职业专业性不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3年度教育学一般项目“新时代我国教师教学公正信念培育研究”(编号:BEA230068)的研究成果。

可或缺的要素。尽管伦理守则的意义重大,却因其远离日常、去情境化的陈述而无法关注教师实践中的大量伦理悖论。〔2〕事实上,教师伦理决策是在个体经验和认知基础上主观建构生成的,是在分析各种情境信息、考察利益相关者,并在多种行动中加以权衡,选择一个在伦理上更“可辩护的行动方案”的过程。〔3〕因此,教师工作的决策环境异常复杂,伦理困境的出现在所难免。百余年来,教师伦理困境在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构建、变革和发展过程始终存在。某种意义上,伦理困境是嵌入现代教育制度的社会事实,它源于现代学校建制的制度基因,在学校历次结构性重塑中逐渐凸显,并在当前教育系统的复杂生态下持续放大。

(一)教师伦理困境根植于现代学校教育的制度基因

理性化是现代社会建立和发展的典型特征。〔4〕现代学校走向理性化伊始,就在其制度“基因”中植入了若干难以调和的价值诉求,包括满足个体作为公民和消费者以及社会追求同一性和多样化发展的一系列二元性目标。现代国家将教育纳入公共行政体系之初,自由、公平、效率和凝聚等原则就已然在冲突和妥协中共生共存。〔5〕为有效统整冲突的价值目标,现代教育试图在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上追求一种效率导向下的“最佳系统”(one best system)。〔6〕政府掌控、专业主导、科层管理、分级分科、班级授课、以考代评等常见的组织技术,逐渐成为世界性制度。〔7〕在被理性塑造的结构中,教师被置于官僚组织的底层和公共服务的前沿,至少面临三方面的冲突。一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代理人,在传授“最有价值”和“最为正确”的知识时,如何回应来自不同利益群体的诘难和自身信念的冲突。二是作为教育行政链条底端的“街道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cy),在自上而下执行“最为有效”的政策方案时,如何面对政策规范、组织目标及公众需求的矛盾而

导致的决策和行动困境。〔8〕三是作为班级管理的首席责任人,面对“拥挤的人群”、“评价性环境”和“权力不平等”交织的课堂环境,如何应对学生背景的多样性和班级生态的复杂性。〔9〕正是现代教育以一元化结构实现多元化目标的制度特征,令教师职业角色在外界至高的期待以及不断的苛责中经历了百年变迁。〔10〕很多时候,教师面临的不只是对与错的判断,更是对与对的取舍。〔11〕他们要寻找最合适的伦理立场,审慎地应对工作中的伦理挑战和风险。

(二)教师伦理困境再生于当代学校变革的制度湍流

学校处于社会变革的前沿,时刻面临外部环境和社会转型的冲击。〔12〕20世纪80年代以降,社会和教育转型的“液态化”趋势日益明显,迫使教师脱离原有的舒适圈、重新适应新的情境要求,从而加剧教师决策的伦理争议和价值冲突。有学者用“湍流理论”(turbulent theory)描述社会转型中教育领导和管理者的伦理处境:他们要在“正义的伦理”、“关心的伦理”、“批判的伦理”和“专业的伦理”的交叠冲击下,努力保持伦理上的动态平衡。〔13〕该隐喻同样适用于描述教师的伦理处境。由于经济全球化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不断拓展,各国教育系统都在组织管理和运行机制上实施相应的重构,教师的责任、义务、承诺与公众期望都发生了显著变化。〔14〕随着市场机制、消费文化及质量改进理念在教育中的持续渗透,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关系也被不断重塑。学校由原来以政治和行政逻辑主导的科层式系统,逐渐演变为由管理式、市场化、联邦式和网络化等多元组织机制扭合而成的复杂系统。〔15〕当行政、市场、专业 and 舆论等各种力量在学校交汇,教师工作也因此面临质量问责的高压与多重制度逻辑的撕扯。于是,如何在个体需要与群体利益、学生自由与学校规范、专业标准与家长诉求间求取平衡,就成为时常困扰教师的两难问题。〔16〕因

而,他们不得不在公平、信任、权力等伦理要素,法律、政策、学校指令等行政要素,教学规范、教育信念等专业要素,以及公众期望、家长诉求等社会要素所构造的伦理迷宫中回旋决断,小心翼翼地各种伦理博弈的湍流下摸索前行。[17]

(三)教师伦理困境频发于时下学校场景的制度摩擦

社会和教育转型的复杂化,让不同的文化和价值在学校场域“并立存在”。[18]因此,教师陷入伦理冲突和决策困境的可能性倍增。现实中,教师往往会因地制宜地对各种竞争性价值目标、改革要求和制度规范进行“组装”和“再造”。[19]这种创造性的实施行动引发的制度“摩擦”,是当前伦理困境频发的重要原因。21世纪,各国教育改革的目标更高远、举措更多元,源于政策、地域和人员方面的异质性交汇成巨大的复杂政策生态。[20]教师在不同的微观场景下,针对多样化的改革内容,遵循不同的制度逻辑,采取适宜的政策行动。这其中,管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制度将同时发挥作用。[21]真实教育过程的制度冲突,也因此越发频繁。首先,受政策因素影响,高利害教育改革的多线并行,让那些与评价、课程、资源分配等教育政策相关的议题构成教师伦理决策困境频发的主要领域。[22]多元文化冲突,也是决策困境的重要方面。[23]教师专业共同体建设、家校协作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教师与同事、学生、家长在频繁互动中也会产生伦理争议。[24]其次,从人员方面来看,不少研究揭示教师的文化—认知倾向对伦理问题识别、规则排序和决策取向产生复杂影响。例如,面对多元文化环境,教师奉行的信念、惯习及情感偏好等认知与非认知因素共同影响他们对伦理处境和价值标准的建构,从而对其决策行动形成更强的道德约束力。[25]另外,从地域因素观之,由于学校嵌入复杂的人际、组织与文化因素构筑的社会空间,在不同层次、性质的规则

与制度交叠之处也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教师如何对各种价值原则做出最适合“当下”场景的排序,这一决策的权变属性也令困境的生成和走向趋于多变。[26]可见,教师身处政策、人员和地域因素编织的复杂情境,面对竞争性制度的同步运行,其伦理困扰和决策困境也更为高频化、复杂化了。

二、困境敞现:多维制度场景下的伦理博弈

当学校教育在结构上逐渐摆脱单一的最佳系统转向多元系统,行政、市场、专业乃至网络权力交织扭合,就构成影响教师决策行动的矛盾张力空间。教师在政府和学校、学生和家、同侪和社群互动中,不得不同时回应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召唤,落实学校和社群的专业要求,满足学生和家长的多样期待,还要力求坚守本我的从教初心。多维场景下的制度交锋和伦理博弈,让基层教师面临一系列公与私、义与利、轻与重的两难抉择,真实的伦理冲突也在这一过程得以敞现。

(一)学校与客户间的公私权衡

学生及家长作为教育服务的主要“客户”,是教师工作面对的首要对象。然而在这最熟悉的场景下,强调秩序、效率和结果导向的行政逻辑,推崇以人为本的教育情怀和追求顾客满意的消费者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潜藏着教师伦理困境的多重触发点。在学校要求的公事公办和回应学生及家长的个性诉求之间,凸显公私权衡的两类决策矛盾。

首先,在“遵照理性按要求完成学校工作”与“遵从己心共情学生的情感诉求”之间,教师该如何决断。例如,在常见的作业布置问题上,当学校要求有关学科为应对区域统考而给学生布置假期作业时,学校的压力、学生的抵触以及教师自我的无奈往往同时袭来。显然,关心、呵护学生成长是教师基本的人本主义价值遵循。教师应增强教学的关怀性,重视学生的学习体验,并关照学生作为生

命体的学习兴趣和态度。〔27〕但学校的课堂并非教师的“自留地”。相反地,学校需要按照外部经济社会的要求,再生产相应的经济社会关系。〔28〕尤其在竞争性展演、标准化问责的下沉压力下,学校往往秉持效益最大化的逻辑,要在校际竞争中力争上游,并不会过多考虑政策执行对师生情感的影响,师生间的关心伦理很容易受到行政秩序的侵扰。此时,教师会更强烈地感受相互对立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价值观带来的伦理冲突。

其次,家校协同和日常交往的密集化催生另一种典型困境,即如何在“按部就班执行学校管理规章”与“换位思考酌情体谅家长意愿”的兼顾中拿捏分寸。这映射模糊的家校合作边界、泛化的家校合作责任和脆弱的家校合作韧性的矛盾。身为班主任的教师会对此深有感触。例如,学校规定每月要按照要求敦促家长完成安全平台的信息填报,严格落实学生长时间病假须家长到校申请,等等。一方面是机械的管理制度,另一方面是复杂多样的家长境况,班主任在中间难免左右为难,忍受家长的不理解和情绪宣泄也就习以为常。其实,理想的家校合作应是围绕学生发展的平等协商、相互配合。〔29〕教师侧重建立良好的家校关系,主动回应家长的教育期待,反馈学生在校的学习状况,提高家长参与度及教育的有效性。但随着教育改革和教育生态的复杂化,家校合作中逐渐挤入不少非教学事务,家长要配合学校完成相应的行政任务,教师在扭曲的家校关系中时常陷入两难。不过,当教师明显感知到家校合作韧性濒临阈值时,也会酌情向家长妥协,遏制潜在的家校冲突,修复紧张关系。

(二) 学生与同侪间的义利纠葛

伦理困境的第二重表现,集中体现在处理与学生有关的教学和管理事务时,教师经常面临专业自主性与合群性的张力撕扯。例如,如果坚持公平和正义原则对待学生,会影响教师个人与同事关系或者威胁到他人利益

时,面对这种义利纠葛,究竟是听从本心的召唤,抑或服从群体的压力?教师职业的专业性体现在个人教书育人过程的专业判断和具体行动中。但与此同时,学校教育又是一个高度有组织、制度化的群体实践,教师之间的分工协作对完成学校的各项任务非常关键。特别是在我国乃至东亚地区,学校的集体主义文化盛行。〔30〕当个人教育信念与群体习俗规范出现矛盾,如何平衡教育性和功利性目标,兼顾师生及同侪关系的和谐,就给教师的日常伦理决策带来挑战和困惑。例如,对中学而言,课时成为教师们在期末竞相争逐的宝贵资源。尤其是一些科目考试结束后,通常会安排其他统考科目教学。这时,任课教师和学生课时安排上的分歧,时常让班主任陷于道义与利害关系的纠结困扰。尽管教师深知,青少年发展需要一些自主选择的空间,但面对同事中形成已久的“要课”规则和机制,他们还是以维护同事间和谐关系为重,避免对集体习俗和规范发起挑战。在学生和专业共同体有关的两难选择中,教师更可能遵从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将学业成绩视作各方的最大现实利益,并据此采取行动,由此引发个人内在的真实感受与外在的情绪扮演不协调的矛盾。〔31〕

此外,义利纠葛下的另一类伦理困境,涌现于教师内部在处置关乎学生利益和福祉问题时产生的角色错位。具体说来,由于学校组织中同时存在层级结构和差序格局,教师会通过职务、职称、教龄、学科、专长等映射地位的不平等。“居中”者多是那些拥有更多头衔、专业权威和资源的教师。“边缘”人则代表那些非主流学科、资源匮乏、话语权弱势的教师。当边缘教师尝试关注并介入学生福祉问题时,“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角色困惑如影随形。例如,一位新班主任试图绕过另一位老班主任去关心过问其班上某位学生是否被公正对待,有可能会引发“让人觉得自己多管闲事”的担忧。教师受关怀伦理和良善正

义的驱使,往往会介入有关学生的正义评判事件。但学校毕竟有明确的责任分工和既定的权力距离,教师在行使专业自主权时需要尊重与同事之间的权责边界,并考虑自身和同事在位置上的对等性。在正式或非正式交往中,教师倾向于采取更温和的策略,当他们意识到同事的顾虑及冲突的苗头时,会尽量规避潜在的麻烦,以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及同侪合作的群体原则。

(三)行政与专业间的轻重决断

教师的专业生活是在学校的行政组织和学科的专业组织中展开的。前者依托官僚层级和行政权力运作,后者更依靠同侪社群和专业权力驱动。两者在结构和权力性质上的差异,带来不同的伦理规范。前者突显理性、效率和自上而下的服从逻辑,后者强调学术权威和对知识生产传播的共同范式的认同与遵循。当两种制度逻辑共线运行时,就衍生教师伦理困境的第三重表现,即在行政压力和专业发展之间轻重缓急的决断。世界范围看,各国教育改革普遍出现过行政、市场和专业伦理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有研究揭示,新自由主义改革将教师专业置于评核主义、管理主义和表现主义压力下。^[32]不断强化教师的行政人角色、弱化其创造性实践,甚至诱发教师去专业化的危机。^[33]

我国学校在行政和专业组织上存在一定的交叠,实践中,两套制度逻辑和伦理规范仍不免出现冲突。特别是近20年来,教育改革很大程度上引入并强化了管理主义和审计文化,加剧了教师工作中“该优先做什么”的决策压力。表现之一,即行政摊派的“急事”和“要事”自上而下进入学校,导致教师不得不开启多线程工作方式,在本职工作和摊派任务间频繁切换。不仅如此,学校在完成行政任务时,无论出于争取上级认可,抑或是为自身卸责的考虑,都倾向采取设定明确的工作目标、约束条件和奖惩举措,以“加码”的方式确保工作任务的理想结果和有效产出。^[34]面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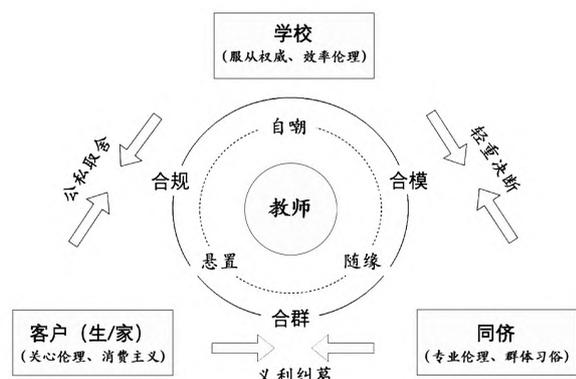
不得不完成的行政任务和所做的“数据游戏”,教师心有不甘却又身不由己。

表现之二,即当教育改革以行政化方式自上而下推动时,来自上位政策的要求和教师在地情境之间的落差,造成一面是改革压力,另一面是实施乏力的困局,教师身在其中、进退失据。尽管学校实施政策时通常会组织动员,但一线教师往往还存在认识上、能力上、条件上、支持上等各方面的障碍和不足。纵然他们观念上认同政策的意义和价值,但压力驱动下,更可能采取选择性、象征性执行的策略。^[35]这似乎是世界范围内教育政策执行和改革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增量的教育教学改革,不仅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冲击学校原本有序甚至有效的教学安排,徒增教师对改革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质疑,加重教师执行政策时的伦理负担。表面上,强调分布式领导和教师赋权;实际上,标准化、制度化盛行的教育情境,^[36]令教师愈发感到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的不受掌控。这种自主性的丧失,加剧了职业发展与行政工作、专业自主与外部要求的矛盾,降低了教师工作的幸福感和职业承诺。^[37]

三、困境应对:行动策略及其伦理后果

在公私权衡、义利纠葛、轻重决断中抉择,对大多数教师而言并不是一件能驾轻就熟、从容应对的事。面对冲突和困境的裹挟,教师内心的“伦理天平”时常处于失衡的状态。应对困境的过程,教师事实上做出一系列妥协并选择了“伦理上最可辩护”的行动方案,但这并非故事的全部。学校处于情、理、法错综交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存并行的复杂环境。^[38]这既是伦理困境的诱因,也蕴含应对困境的多元策略。受政治人类学家斯科特(Scott, J. C.)的启发,一线教师至少会在两套不同的制度脚本,即所谓公开剧本(public transcripts)和潜隐剧本(hidden

transcripts)中进行切换,[39]以此应对伦理困境和危机。前者即教师在公开场合以被制度认可的方式与系统进行的互动,是教师日常伦理实践的台前展示;后者则更多的是以非公开、隐晦、密码式的方式所表达的声音和诉求,就像“平静水面下涌动的潜流”,是教师困境应对行动的幕后敞现。一般而言,教师在公开场合更倾向将学校的管理规章、群体惯习和考核要求等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置于伦理决策的优先级,以彰显个人对组织的服从,寻求教职生涯的安全稳定;而在工作之外的私人空间和生活场景,他们又不免会卸下日常的制度伪装和情绪整饰,以个性化、潜隐化的自我调适和意义创造策略,消解制度化行为带来的自我怀疑、风险恐惧和价值虚无感,寻求教师自我与系统世界的和解。(见下图)



教师应对伦理困境剧本图

(一) 困境应对的制度化策略: 公开剧本及其收效

大多数教师面对伦理决策困境时,更倾向按照刚性制度、群体规范和高压问责的要求行事,这些不言自明的“制度处方”构成他们伦理决策和困境应对的公开剧本。要完成与工作相关的各项事务,同时能获得组织、群体和系统的接纳和认可,教师须不断在各种制度压力下做出伦理上的调适、取舍和妥协。与国外高利害教育改革下的教师处境相似,折中而行成为他们应对压力和变革的惯常行动取向。[40]只不过,中国中小学一线教师在公开的困境应对行动上,更表现为“有偏向的

折中主义”色彩。即在私人情感和学校规定间,偏向以合规为准来采取行动,抑制或者调适个人内在的情绪情感体验;在个人理念和群体习俗间,侧重走合群主义路线,隐藏或者克制自己真实的观念和主张;在专业判断和行政评价间,服膺合模的绩效管理逻辑,[41]延缓专业发展和自主决策的相应诉求。

不容否认,遵循合规、合群与合模的行动取向,可让教师个体减轻伦理决策时的认知负荷、简化行动流程,但这种自我规训的策略,表面上给教师带来摆脱困境的安全感,却在更深层面上让教师的伦理实践走向异化。其一,伦理困境的制度化处方不可避免会形成一种管制性及规范性压力,在管控教师越轨和失范行为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抑制、束缚了教师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甚至会滋生免责、避坑和但求无过的处事心态,消解着学校的办学活力。其二,制度化策略并不是应对困境的万应良方、万全之策,尤其是在诸如行使教育惩戒权等敏感问题上,仍存在一些政策法律和配套制度难以覆盖的结构性漏洞与灰色地带,单一性的公权规制难以让教师无后顾之忧地采取行动。[42]例如,教师出于“为学生着想”和“对学生负责”而施以管教或批评的行为,却很有可能被家长投诉为“恐吓孩子”;学校在应诉压力下启动调查程序往往又会让教师感到不被信任和缺乏支持。在怕被举报、问责、排斥的焦虑围攻下,教师也陷入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当中。[43]现实中,教师感到如履薄冰、瞻前顾后、进退失据的情形并不鲜见。教师的风险预判能力、情绪管理和情感劳动都成为困境应对中至关重要的变量。这让不少个性鲜明的教师感到无所适从,稍有不慎或许就无法全身而退。因此,参照制度化的策略行动,可以提升教师应对困境的安全系数,但也只是使之处于相对稳定的职业状态,与教育家精神所期待的教育境界还相去甚远。当“只求不犯错”成为教师处世原则时,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调动教师的

工作积极性,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让教师成为受社会尊敬的职业,恐怕将沦为无法企及的虚幻目标。

(二)困境应对的个体化策略:潜隐剧本及其影响

上述制度化的困境应对策略,并未让教师内心经历坦然和自洽。相反,为了避免可能的工作风险失误,有的教师常处于与自我、同事以及工作本身的割裂状态,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倦怠心境频繁来袭,迫使他们在制度化的组织生活之外探索某种调适自我、对抗压力的空间与形式。于是,在困境应对的公开剧本之外,一线教师还逐渐发展出一套个体化、潜隐化的行动策略。

首先,一些教师以自嘲的方式,平复内心的自我怀疑。教师并不确认公开场景下应对困境的决策是否为伦理正当,伪装的行动也无法消减其内心的焦躁和疑虑,困惑与怀疑导致教师难以建构真正同一的自我概念。为此,当从工作退归生活时,有的年轻教师更倾向以某些自嘲的方式描述自身的处境,在亲友社交中吐槽内心矛盾与疏解情绪栓塞的调侃,通过小圈子的共情,弥合理想和现实间的分裂感,抵消公开剧本演绎所带来的心理负荷。

其次,一些教师以悬置的心态,强化个体的危机防御。经历过伦理危机事件冲击后,有的教师更倾向于在工作、同事和家长之间确立并维系一种若即若离和超然世外的关系。这类似社会学者所谓的悬置姿态,即将自身的社会、政治和专业主体性从工作实践的困顿中抽离出来、置身事外的悬浮态。^[44]以“旁观者”的角色行事避免卷入纷争。这些非正式、潜隐化的言语和行动,映射教师内心启动的某种危机防御机制。

另外,一些教师以随缘的思维,消解工作的意义“虚无”。教师应对日常伦理困境中累积的怀疑和困顿,会缓慢蚕食他们对教育职业的热情和忠诚。当从教的初心在应对伦

理困境的损耗下降格为在学校安全度日的犬儒心态,就使教师和教学的关系异化为维持生计的交易性依赖,而不再是能安顿己心的互惠性关系。有的教师在工作生活中逐渐形成一种随缘的观念,以此应对工作意义感的缺失、工作成效的不确定以及无处不在的内卷竞争。“不强求”、“放下执念”,成为他们面对困境时给自己解围的习惯性说辞。为规避职业风险和压力,他们婉拒教学外的一切任务安排。

借助个体化的潜隐剧本策略,教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执行公开剧本带来的割裂、游离和迷失的困惑;也为他们进一步化解伦理困境,开辟了必要的社会空间和媒介载体。但明显,教师在应对伦理困境的两套剧本中进行切换,更多的只是实现了对困境的适应以及与现实的和解,却并未实现本真性自我的持续成长和壮大。这并不是安好的自我存在,它难以给教师提供直面挑战时“成事”与“为己”的内源力量,反而会令他们的内心逐渐滑向麻木和倦怠。

四、困境突围:

以教育家精神更新教师伦理实践

学校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并受国家和专业力量主导的场域。教师工作看似有标准化的规范流程,实则充斥着权宜相变的不确定性。教职绝非一项按部就班、按图索骥的机械工种,而是在伦理上充满矛盾、争议和挑战的复杂劳动。本文进一步确认了教师伦理困境作为一种典型的教育社会事实,源于现代学校的制度构建与持续变革,并伴随当代教育系统的演化趋于复杂。在学校、学生(家长)和同侪交织互动的日常实践中,一系列公私权衡、义利纠葛及轻重决断,构成困扰教师的典型伦理困局。公开场合下,教师用一系列制度化的处方应对困境。个体生活中,教师又借一系列潜隐策略来调

适自我。频发的决策困境和异化的伦理实践,消解着学校的办学活力,挫伤了教师的成长内力。

当下,我们正在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积极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相契合的高质量创新型教育,这给教师队伍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2024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国家战略,充分体现了“强教必先强师”的坚定决心。从加强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权益保障、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务实举措。在9月9日至10日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更加明确地指出,“要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新政策新部署,既为广大教师切实走向大国良师的新境界提供了引导和支持,也为他们重塑教育信念并真正从伦理困境中“突围”创设条件、创造契机。

事实上,弘扬教育家精神、培育教育信念,与教师伦理困境破局具有内在一致性。其一,复杂社会的价值冲突和伦理争议,是教师自觉追求教育家精神过程必须迎接的挑战。当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大,教育内部的复杂性和冲突性愈发明显,教师更有可能被置于伦理争议的风口浪尖。新教师的教师无法回避挑战,必须迎难而上、求变创新,以更智慧的方式从困境“突围”,以更优雅的姿态与困境“共舞”,将困境转化为促进自我成长的沃土和向教育家迈进的能量。其二,教育家精神的弘扬,为困境突围的教师提供了重拾初心的信念和勇气。教育信念是教师确信并坚守的关于自我、学生及教育的看法与理念,是教师人生的精神支柱及其专业精神的核心内容。^[45]那些困境中的彷徨

和应对时的无奈,侵蚀着教师个体的从教初心和群体的价值坚守。唯有强效的精神伦理滋养,才能帮助他们摆脱行动的忌憚和退缩、走出内心的割裂和迷失。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作为一股铸魂强师的强大精神能量,无疑为提振教师队伍育人信念和责任使命提供了宝贵的伦理资源。其三,教育家精神的涵育,呼唤加强教师队伍在应对伦理困境和危机上的能力建设。伦理挑战和价值冲突是教师职业及学校制度内生性的“顽劣问题”(wicked problem)。^[46]从容应对和有效处置伦理困境,是教师个人与组织专业能力的必要组成,也是教师个人和社群专业发展的题中之义。有学者指出,教育家精神的培养需要重构教师与自我、知识和社会万物间的多重关系。^[47]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对教师伦理实践进行系统更新。《意见》切中要害,针对教师个人、学校组织、社会环境等方面提出的加强教育培训、模范引领、组织生活、环境和氛围营造等相应举措亦可谓正当其时。在组织实施中,应加强教师队伍的伦理能力建设,深化教师教育信念培育路径的研究探索,赋能广大教师在弘扬教育家精神的伦理实践中行稳致远。

首先,重视教师专业发展中的伦理之维,夯实培植教育信念的智识基础,补齐教师应对日常伦理困境时存在的素养短板。目前的教师专业发展更侧重提升教师业务能力素养,师德教育也更强调思想、观念和知识的引导,至多涉及教师心理健康和压力疏导等保健性主题。换言之,我们更关注教师作为专业工作者的绩效表现,而相对忽视了其作为教育实践者的伦理属性。伦理是一个关系概念,脱离对人的关注和情境的讨论,伦理将变为抽象空洞的戒律而失去对关系的营造效力。为此,从更新教师伦理实践的角度出发,还应将教师及其工作情境的复杂性融入专业发展项目的设计,为厚植教育家精神、坚定教育信念提供扎实的伦理知识与能力基础。一

方面,积极探索理想信念和师德师风教育入脑走心的渠道和机制。开发接地气的教育家精神课程教材资源,探索贴地式的教育信念培育模式。尽精微而致广大,将小我融入大我,以大我唤醒真我,由内而外地树立对良善美德和教育使命的信仰。另一方面,还应强化对教师工作复杂情境的认知和洞察,加强与各方利益相关者打交道所需的教育、心理、法律、政策、文化和社会情感等必要的知能储备,引入“规范性案例”(normative cases)等方法,[48]提升教师在日常伦理困境下的道德敏感性和推理能力。鼓励教师依托学科组、教研组等开展“基于团队的模拟训练”(team-based simulations),[49]帮助教师思考和处置复杂的伦理冲突议题。

其次,重视教师专业生活中的伦理向度,搭建共享教育信念的组织网络,创设有助于让教师心灵更新及社群再造的伦理空间。世界范围内那些真正成功的学校,绝不仅关注学生学业表现这样狭隘的教育生产力指标,师生的身心福祉越来越成为卓越教育应有的愿景。[50]因为好的教学并非出于某些具体的技术,而是源自教师内在自我的一致与整全。让教师活出本真的伦理生活也唯有依托真正的专业伦理社群才能实现。当所有教师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教师专业共同体只是制度化的工作组织,并非教师个人及其群体生命实践的生活场所,学校和社群的伦理生活也就丧失了应有的空间,教师群体的共同价值追求也就无法践行。为此,须加强党建带群建,营造关心伦理为导向、基于信任的共同体文化。参照诺丁斯(Noddings, N.)有关“重新带回目的性讨论”(bring back aims talk)的倡议,[51]在教师业务能力发展的常规活动之外,依托学校、联盟、集团乃至跨界学习的组织形式,创设让教师直面伦理困境、彼此分享心声、坚定教育信念的社群空间,以敞开、聆听、支持和互助为导向的伦理生活为教师的内心“充电增能”。

另外,重视教师专业实践中的伦理生态,构筑守护教育信念的社会屏障,打造能让教师安心从教、勇于担责的良性外部环境。教师的伦理困境嵌入多重文化和制度逻辑的交叠影响域,不仅是教师和学校的问题,更是一个系统生态性的征候。教育家精神的弘扬、教育信念的培育和践行,除了在教师个人和社群组织层面发力,更离不开营造适宜的教育和社会氛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加强教师待遇保障,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让教师享有崇高社会声望、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52]。

为此,一是要进一步厘清家庭和学校互动的伦理关系,明确双方教育合作的权责范围。增进家校互信、优化家校合作,降低公私权衡给教师带来的困扰,实现双方育人过程互利共生与良性互动。二是要进一步确认教学和服务的伦理边界,确保教师教学主阵地不受侵犯。切实推动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学工作负担有关政策的落地,祛除附着在非教学工作任务中潜在的伦理冲突因子,弱化轻重决断给教师造成的困惑,为教师提供专注教书育人的清朗氛围。三是要进一步完善教师专业地位和权益保障的制度体系,为教师伦理实践的更新创设友善的法制、政策和舆论环境,减轻义利纠葛对教师工作的影响,规避教育教学中的道德风险,遏制教师群体中应激焦虑的滋生蔓延。总之,只有协同各方力量、统整多重因素,才有助于凝聚守护教师教育信念的合力,保障教师伦理实践的更新。

参考文献:

- [1] 菲利普·杰克森. 什么是教育[M].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 137—152.
- [2][13] 琼·夏皮罗,史蒂文·格罗斯. 激荡时代的伦理教育领导:破解伦理困境[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24. 3—5、6—7.
- [3] 程亮. 教师伦理决策:概念、结构与特性[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
- [4]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

馆,1997.56.

[5] Labaree, D. Someone Has to Fail: The Zero-Sum Game of Public Schooling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42—79; Carnoy, M., Levin, H. Schooling and Work in the Democratic State [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44—176.

[6] Tyack, D. The One Best System: A History of American Urban Education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28—77.

[7] Meyer, J.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as an Institution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 (1).

[8] Lipsky, M. Street Level Bureaucracy: Dilemmas of the Individual in Public Services [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0. 27—80.

[9] 菲利普·杰克森. 课堂生活[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22—34.

[10] Goldstein, D. The Teacher Wars: A History of America's Most Embattled Profession [M]. New York: Doubleday, 2015. 3—5.

[11] Cranston, N., et al. Ethical Dilemmas: The "Bread and Butter" of Educational Leaders' Lives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2006, (2); 苏启敏. 教师专业道德决策: 概念、依据及实践推理 [J]. 教育研究, 2015, (1); Ehrich, C., et al. Ethical Dilemmas: A Model to Understand Teacher Practice [J]. Teachers and Teaching, 2011, (2); Levinson, M. Moral Injury and the Ethics of Educational Injustice [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2015, (2).

[12][28] 萨缪尔·鲍尔斯, 赫伯特·金蒂斯. 美国: 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 195—212.

[14] Biesta, G. Education, Accountability, and the Ethical Demand: Can the Democratic Potential of Accountability Be Regained? [J]. Educational Theory, 2004, (3); Zhang, W., Bray, M. Micro-Neoliberalism in China: Public-Private Interactions at the Confluence of Mainstream and Shadow Education [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17, (1); Fransson, G. Grannäs, J. Dilemmatic Spaces in Educational Contexts: Towar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Dilemmas in Teachers Work [J]. Teachers and Teaching, 2013, (1).

[15] Peurach, J., et al. From Mass Schooling to Education Systems: Changing Patterns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Instruction [J].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2019, (1).

[16] Shapira-Lishchinsky, O. Teachers' Critical Incidents: Ethical Dilemmas in Teaching Practice [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11, (3); Colnerud, G. Ethical Conflicts in Teaching [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1997, (6); Börü, N. Ethical Dilemmas: A Problematic Situation for Teacher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gressive Education, 2020, (3); Campbell, E.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Collegial Loyalty as One View of Teacher Professionalism [J]. Teachers and Teaching, 1996, (2).

[17] Johnson, L., et al. A Model for Making Decisions about Ethical Dilemmas in Student Assessment [J].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2017, (2).

[18] Best, S. Education in the Interregnum: An Evaluation of

Zygmunt Bauman's Liquid-turn Writing on Education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17, (2).

[19] Ball, S., et al. How Schools Do Policy: Policy Enactm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 [M]. London: Routledge, 2011. 9—120.

[20] Honig, M. New Directions in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Confronting Complexity [M]. New York: SUNY Press, 2006. 1—4.

[21] Scott, R.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1. 52—57.

[22] Gao, R., et al. An Expanded Ethical Decision-making Model to Resolve Ethical Dilemmas in Assessment [J]. Studies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2021, (68).

[23] Davies, M., Heyward, P. Between a Hard Place and a Hard Place: A Study of Ethical Dilemmas Experienced by Student Teachers While on Practicum [J].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019, (2); Zhu, G. Chinese Student Teachers' Perspectives on Becoming a Teacher in the Practicum: Emotional and Ethical Dimensions of Identity Shaping [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Teaching, 2017, (4); Waked, J., Moshel, S. Ethical Dilemmas Facing Female Teachers in the Arab Education System in Israel [J].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2023, (4).

[24] Shapira, L. Towards Professionalism: Ethical Perspectives of Israeli Teachers [J]. Europea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2009, (4); Finefer, R. Discipline Lessons from American Faith-based Autonomous Schools: a Narrative of Power and 'Mini-public' Ideology [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22, (2).

[25] Colnerud, G. Moral Stress in Teaching Practice [J]. Teachers and Teaching, 2015, (3); 祝刚. 西方教师伦理研究: 回溯与评论 [J]. 外国教育研究, 2019, (2).

[26] 伊丽莎白·坎普贝尔. 伦理型教师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77—79; 蔡辰梅, 徐萍. 制度下生存与教师的专业道德困境 [J]. 教师教育研究, 2007, (1); Heikkilä, M., et al. Ethical Dilemmas and Well-being in Teachers' Work: A Three-wave, Two-year Longitudinal Study [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23, (125).

[27] 侯晶晶, 朱小蔓. 诺丁斯以关怀为核心的道德教育理论及其启示 [J]. 教育研究, 2004, (3).

[29] 高德胜. 家庭作业的伦理审视 [J]. 教育发展研究, 2021, (18).

[30] Chen, L., Zhang, J. Exploring the Role and Practice of Teacher Leaders in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a Shanghai Secondary School [J]. Educational Studies, 2022, (5).

[31] 沈伟, 等. 逆境中的坚守: 乡村教师身份建构中的情感劳动与教育情怀 [J]. 教育发展研究, 2020, (22).

[32] 林小英. 素质教育20年: 竞争性表现主义的支配及反思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9, (4).

[33] 董辉, 等. 教师的工作负担、角色异化与减负治理 [J]. 教师教育研究, 2022, (5); 钟景迅, 刘泱. 教师减负的悖论: 去专业化的困境与再专业化的陷阱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1, (6).

- [34] 杨华. 县乡中国: 县域治理现代化[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27—36.
- [35] Giudici, A. Teacher Politics Bottom-up: Theorizing the Impact of Micro-politics on Policy Generation [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21, (6).
- [36] 宋萑. 教师工作负担的时间社会学分析[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 (9).
- [37] Lin, Q., Gao, X. Exploring the Predictors of Teachers' Teaching Autonomy: A Three-level International Study [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23, (135).
- [38] 魏戈, 刘蕊. 中国式情、理、法的平衡——基于教育实习中两难空间的叙事分析[J]. *教育发展研究*, 2024, (4); 周雪光. 论中国官僚体制中的非正式制度[J]. *清华社会科学*, 2019, (1).
- [39] 詹姆斯·斯科特. 支配与抵抗的艺术: 潜隐剧本[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2—5.
- [40] Cuban, L. Hugging the Middle: Teaching in an Era of Testing and Accountability, 1980—2005 [J].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Archives*, 2007, (15).
- [41] 曾荣光. 从教育质量到质量教育的议论——香港特区的经验与教训[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6, (1).
- [42] 林鸿潮, 王进威. 教育惩戒的公私法融合规制路径[J]. *教育研究*, 2024, (8).
- [43] 帕克·帕尔默. 教学勇气[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79—85.
- [44] Xiang, B. Suspension: Seeking Agency for Change in the Hypermobile World [J]. *Pacific Affairs*, 2021, (2).
- [45] 肖正德. 基于教师发展的教师信念: 意蕴阐释与实践建构[J]. *教育研究*, 2013, (6).
- [46] Burns, T., Köster, F. Governing Education in a Complex World,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R].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6. 41—53.
- [47] 靳玉乐, 王潇晨. 论教育家精神的培养[J]. *教育研究*, 2024, (8).
- [48] Gurr, S., Forster, D. Using Normative Case Studies to Examine Ethical Dilemmas for Educators in an Ecological Crisis [J].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2023, (10).
- [49] Shapira, L. Team-based Simulations: Learning Ethical Conduct in Teacher Trainee Programs [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13, (33).
- [50] Day, C., Kington, A. Identity, Well-being and Effectiveness: The Emotional Contexts of Teaching [J]. *Pedagogy, Culture & Society*, 2008, (1).
- [51] Noddings, N. *Happiness and Educ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74—94.
- [52]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N]. *人民日报*, 2024-09-11.

Tackling the Dilemmas of Teachers' Ethics: Focusing 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Belief in Education

Dong Hui & Gao Wenxin

Abstract: The essential moral attribute of education adds a strong ethical color to teachers' work. Ethical challenges and dilemmas are inevitable in their practice of education by preaching, teaching and resolving doubts. The ethical dilemmas of teachers stem from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the continuous reform of moder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practice-based scene wher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students (parents) and peer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eachers are troubled in their ethical decision-making by the balance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s, and the conflicts between justice and interests. In their work, teachers need to use institutionalized public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 difficulties; in their life, they need to adjust themselves with corresponding hidden strategies. Frequent decision-making dilemmas and dissimilated ethical practices diminish the vitality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undermine the internal force of teachers' growth. To tackle the dilemmas of teachers' ethics, we need to consolidate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belief in education, make up for their poor competence to cope with ethical dilemmas, create a community for their spiritual empowerment, build a 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r their teaching at ease, and help them to make steady progress in their ethical practice of carrying forward the spirit of distinguished educators.

Key words: the spirit of distinguished educators; teacher's ethics; belief in education; ethical dilemma

Authors: Dong Hu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ao Wenxin, doctoral candidate of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责任编辑: 杨雅文]